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 理论逻辑与内在机理研究

肖亮^{1,2}, 王家玮³

(1. 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8; 2.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3.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关联畅通和经济良性循环流转, 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展。现代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处于核心环节, 是衔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桥梁和纽带, 在破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面临的痛点、难点及堵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着眼畅通双循环, 构建了“四功能打造、六化转型、五体系升级”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逻辑模型, 提出了现代流通体系在实现更高水平生产与消费循环、更高质量城市与农村循环、更高层次内外贸市场循环、更加协调跨区域市场循环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从信息传导、结构牵引、要素优化和科技创新四大功能出发, 阐述了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内在机理及关键机制, 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 双循环; 现代流通体系; 理论逻辑; 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 F72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22)01-0005-14

DOI: 10.14134/j.cnki.cn33-1336/f.2022.01.001

Theoretical Logic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Dual Circulation in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XIAO Liang^{1,2}, WANG Jiawei³

(1. Modern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busines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ycle” lies in promoting smooth industrial linkages and virtuous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Th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is the core link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ain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blocking poi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Focusing on smooth Dual Circul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gical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of “four-function building, six-transformation and five-system upgrad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role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in realizing higher-leve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ycle, higher-quality urban and rural cycle, higher-level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market cycle and more coordinated cross-regional market cycle. Then, focusing

收稿日期: 2021-08-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复杂社群影响情境下即时众包物流平台协同演化机理及治理机制研究”(19BGL09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互联网经济视阈下中国分销渠道体系重构及竞争力提升研究”(18JJD790014); 浙江省重点软科学研究项目“农村电商赋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机理与对策”(2022C25042)

作者简介: 肖亮,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王家玮,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研究。

on the four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tructural traction, factor optim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key mechanism of smooth Dual Circula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internal mechanism

一、引言

近年来,外部环境波动的持续加剧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依靠出口拉动的“外向型”逐步转变为通过内需动力主导的“以内促外型”(王一鸣,2020;张倩肖和李佳霖,2021)^[1-2]。为进一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丰富和运用,旨在依托国内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内需的巨大潜力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不确定性变化(李震等,2021)^[3],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仍面临一系列堵点和断点,如生产与消费结构性失衡、内外贸市场割裂、城乡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作为衔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桥梁和纽带,流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破解区域壁垒、市场壁垒和城乡壁垒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刘瑞,2020;王韬钦,2021;蒋永穆和祝林林,2021)^[4-6]。2020年9月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出了“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等重要论述。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要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因此,有必要系统研究并揭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内在逻辑及路径。

目前,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体系内涵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理论研究领域。在流通体系内涵与界定方面,林周二于1977年指出,流通系统作为一个体系,是由制度系统(社会系统)与实体系统(物理系统)两个方面构成的社会系统^[7]。在我国,流通体系主要是指宏观视角下的流通模式和流通制度(祝合良等,2021)^[8]。随着传统流通逐步转型为现代流通,现代流通体系的研究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三体系论”根据流通活动中的不同职能将现代流通体系划分为现代流通运行体系、现代流通保障体系以及现代流通规制体系(祝合良,2020)^[9]。“四体系论”中将现代流通体系进一步细分为政策法规与行政管理体制、国内流通体系、国际流通体系以及支撑与保障体系(孙前进,2011;张俊娥,2018)^[10-11];部分学者则从流通客体视角出发,认为现代流通体系主要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四部分(朱立龙等,2012;王先庆,2020)^[12-13]。在双循环理论研究方面,先前的双循环战略强调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在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的背景下,通过积极开拓世界市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李震等,2021)^[3]。但受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这一形成多年的“两头在外”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应运而生。学者们主要聚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徐奇渊,2020)^[14]、内涵(李震等,2021;黄群慧,2021)^[3,15]、内在逻辑(姚树洁和房景,2020;钱学锋和裴婷,2021)^[16-17]及实施路径(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18]等方面。如徐奇渊(2020)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由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发展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14]。李震等(2021)指出只有实施双循环才能牢牢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从而将对外贸易内嵌于国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3]。这一格局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阶段后的高水平的自强自立(黄群慧,2021)^[15],是在历史逻辑与特定阶段的发展条件相耦合作用下,要素、市场、技术等结构性动态变化与比较优势重塑的过程(高丽娜和蒋伏心,2021)^[19]。在该过程中,双循环以产业升级为先导,以促进消费升级为目标,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步开启“内循环”的自我强化,并最终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姚树洁和房景,2020)^[16]。而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实施路径方面,学者们认为应从打通供需(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18]、推动消费产业双升级(高伟和陶柯,2021)^[20]、推动现代流通升级(祝合良等,2021)^[8]等方面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

通过梳理可发现,现有研究面临以下局限: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流通功能发生重大改变,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又赋予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新的战略与使命。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现代流通体系的内涵及特征,尤其是双循环背景下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亟须重新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内涵及特征。另一方面,目前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研究仍较为碎片化,尚未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逻辑框架模型,有关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内在机理及关键机制仍有待研究。

鉴于此,文章拟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内涵,并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模型,进而系统地揭示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内在机理及对策,从互动、协同的视角构建一个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全新研究框架和范式。文章旨在厘清三个问题:第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功能、内涵及战略使命是什么?第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畅通双循环的逻辑框架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第三,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畅通双循环的内在机理及具体实施对策是怎样的?

二、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框架模型与内在逻辑

(一)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框架模型

如图1所示,现代流通体系以促进供需协同升级、流通降本增效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充分发挥精准衔接产销的市场信息传导功能、引导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构牵引功能、深度链接内外市场的要素资源配置功能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创新功能,大力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网络化、普惠化、融合化转型,从而促进流通主体体系、流通客体体系、流通技术体系、流通网络体系、流通治理体系五大体系的全面升级,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与消费循环、更高质量的城市与农村循环、更高层次的内外贸市场循环、更加协调的跨区域市场循环,最终将现代流通体系打造成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全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路径

1. 推动“六化”转型。第一,数字化。李天宇和王晓娟(2021)认为,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提质增效的“新蓝海”,也是我国经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路径^[21]。流通数字化是以新信息技术为支撑,为解决新技术背景下供求矛盾及提升流通效率的手段(谢莉娟和王晓东,2020)^[22],其核心是把握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快流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升流通要素资源的数据化程度,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线上线下融合,进而依托数智融合及产业链全链数字化提升加速赋能传统流通企业,推动其逐步发展为现代流通体系的同时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

第二,国际化。徐锋等(2018)认为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内外贸一体化^[23]。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提高内贸流通的对外开放水平。流通国际化是将流通范围扩大至更广泛的区域,推动更深层次的要素流动,促进供需匹配。其关键在于进一步发挥流通连接内外贸市场的“黏合剂”作用,通过畅通内外贸渠道深化流通业发展,破除妨碍内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障碍,实现国内外流通要素资源的自由、有序流动,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其中既包括国外流通要素资源的引进,也包括国内流通要素资源“走出去”。

第三,绿色化。马克思主义商品流通理论指出,流通是联系自然与人、个人与社会从而自然与社会的载体,是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交换体系(晏维龙,2009)^[24]。现代流通体系绿色化是基于经济绿色转型,以绿色化为导向发展的新型现代流通体系。进一步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绿色化的关键在于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以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优化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信息技术开发创新以及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打造绿色、环保、低碳的产业链,构建绿色循环流通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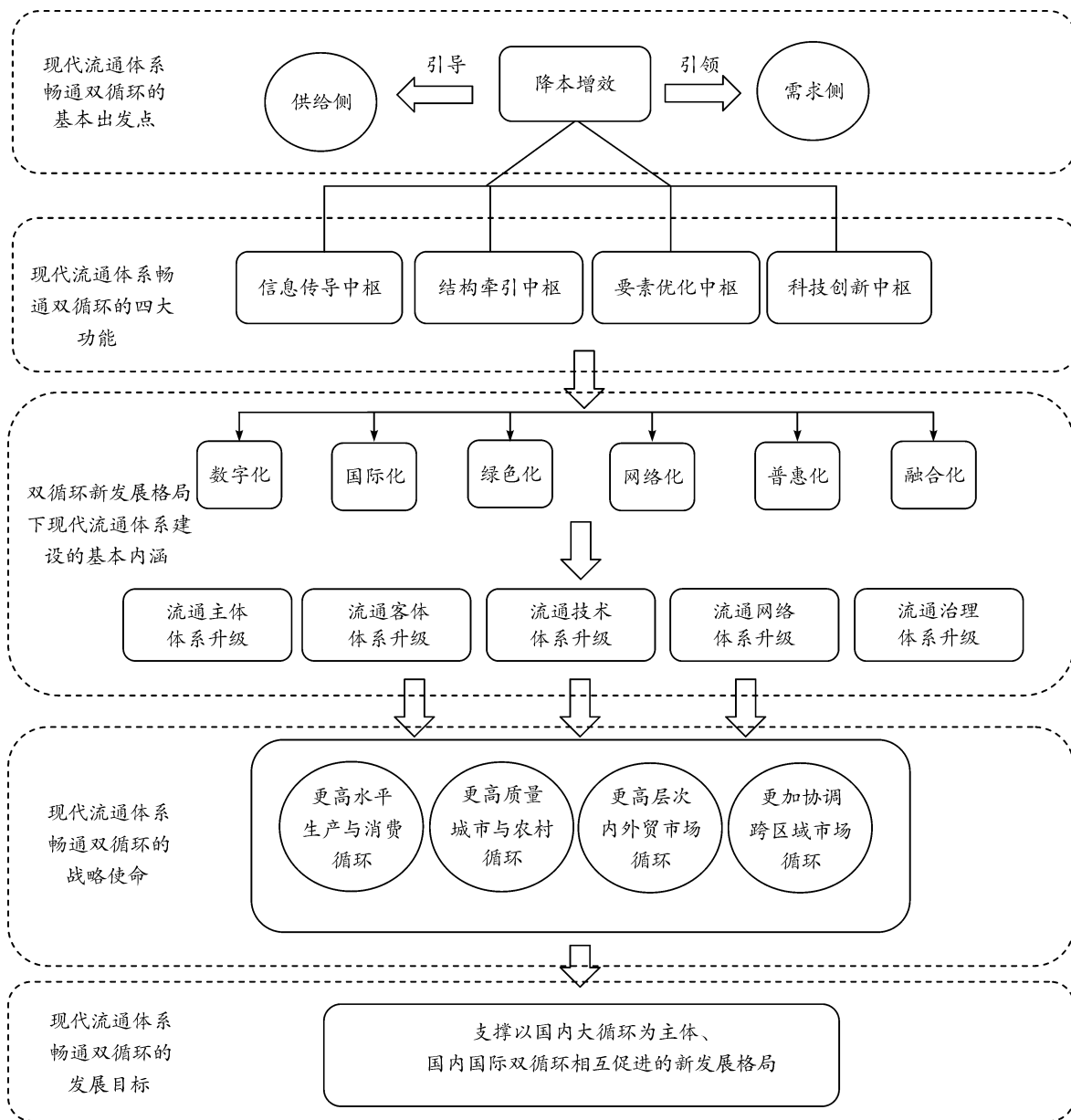


图1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理论框架模型

第四,网络化。王雪峰和荆林波(2021)提出,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在于畅通内部循环和促进内外循环连接转换顺畅^[25]。基础设施是流通的骨架,现代流通体系的网络化发展即为依托流通基础设施及流通渠道升级打造辐射全球的流通网络体系。其关键在于通过流通网络推动产品和要素等打破区域市场壁垒,以更便捷、更快速的方式实现产业和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流通与交换,使现代流通体系成为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第五,普惠化。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基础和兜底功能,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进一步纾困和增强发展活力。现代流通较传统流通而言能够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经济普惠化发展。而实现现代流通体系普惠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发挥流通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吸纳大量劳动人口就业,促进稳岗扩岗;另一方面,依托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信息技术,连接价值链主体,整合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建立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进一步促进商产融合,实现供给侧协同发展。

第六,融合化。王雪峰和荆林波(2021)认为流通业已经进入融合期,主要表现为线上线下融合加快,

基于平台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趋势显现,生产和消费也呈产销合一的融合态势^[25]。现代流通体系融合化发展能够促进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流通业融合化主要在于促进传统流通供应链各环节变革,优化流通要素资源的组织方式,如柔性化、连锁化、供应链组织化等,通过高能级虚实平台的打造及基于平台的产业生态链重构优化流通要素资源的配置机制,整合流通资源,推动传统流通升级为现代流通体系,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内涵式”融合发展。

2. 促进“五体系”升级。第一,流通主体体系升级。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等重要论述,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关键在于强化流通主体,流通主体主要是指从事流通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流通主体体系则是不同的流通主体联结组成的体系。流通主体体系升级的核心在于以构筑流通企业竞争新优势为目标,加快流通市场主体体系升级。其中,既包括采用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来提升传统流通企业的经营能力以及应用数字化技术等现代化理念来创新流通企业的新模式,构筑新商业生态,也包括主体间提升产业横纵向一体化串联的能力,通过资源整合及共享构建竞争优势。

第二,流通客体体系升级。流通客体体系主要指流通领域中用来交换的商品及服务构成的体系。曹允春和连昕(2021)认为,现代流通体系在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可以不断化解企业的结构性过剩产能,以市场需求来引导生产供给向高质量方向发展^[26]。流通客体体系的搭建与完善一方面在于通过孵化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新型消费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形成供需精准对接的流通客体体系;另一方面在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通过品牌赋能提升流通商品服务品质及产品附加值,增强商品和服务竞争力。

第三,流通技术体系升级。2020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发展水平。现代流通技术体系主要指更低成本、更高效地支撑现代流通体系正常运转的一系列信息技术手段。现代流通技术体系升级的核心在于推进数智融合及全链融合,利用互联网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通过底层数据协同、中台数智运营、前端数字服务等融合手段推动产业链全链数字化水平提升,提高流通体系整体效能。

第四,流通网络体系升级。王雪峰和荆林波(2021)认为双循环不是要淡化对外开放,而是要畅通内部循环和促进内外循环连接转换顺畅^[25]。这首先就是要打破地区封锁与分割,破除地区保护主义。流通网络是通过流通点、线连接而成的纵横交错、形如蛛网的流通结构有机体,不同流通网络构成了支撑经济交易转移的流通网络体系。流通网络体系是经济循环发展中要素和产品实现空间位移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构建现代流通网络体系的关键在于流通基础设施和渠道升级,通过推进核心商圈、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及高能级平台的设施建设与优化,完善商品零售渠道体系、工业品分销体系、农产品分销体系以及生产资料分销体系,构建高效快捷、安全有序的现代流通渠道网络。

第五,流通治理体系升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推行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设行动,而由营商环境、流通管理体制及法律法规等构成的流通治理体系正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既包括政府对流通过程的管理和服务,也包括流通过程中的各类市场主体、中介组织、媒体和消费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自律性管理活动中涉及的规制体系。流通治理体系升级的核心在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及行业标准约束等方式建立健全的流通管理机制,打造统一协调、分级负责、反应迅速的市场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策规制作用以构建规范化发展的营商环境。

(三)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战略使命

1. 推动生产消费协同并促进形成更高水平生产与消费双向循环。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流通业不仅是消费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内容,也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点。从需求侧看,现代流通体系与消费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胡东宁和李沐霖,2020)^[27]。依托现代流通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构建的信息收集以及共享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让消费者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以及定价等各个环节,改善供需错配的困境,推动生产要素从产能过剩领域向有市场需求的领域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对消费市场的高品质有效供给。从供给侧看,一方面,现代流通对消费

信息的变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迅速地捕捉和察觉市场产品供需和商品价格变动情况,向上游制造业企业及时反馈并引导制造业适时调整生产规模及产品价格,推动产销精准对接;另一方面,随着流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其得以更加精确地联动生产,发挥整合能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且部分制造企业为了让产品实现适销对路会选择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与流通业搭建实时联动的信息平台,降低供需不匹配的市场成本,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2. 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并促进形成更高质量城市与农村双向循环。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布的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但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公共资源及人才环境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农民收入较低、农业供给与需求市场的衔接不够紧密、信息对接与流通渠道不畅,客观上造成农村消费供给不足、消费环境供给不佳等问题,农村消费潜力无法得到释放。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可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需求侧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鸿沟,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渠道,激发农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提振乡村消费,构建更加完善的需求体系。在供给侧,一方面通过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农产品分销体系,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机制,带动规模化生产,推动农业生产组织转型升级,带动城乡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产供销联盟、农超对接、全程可追溯服务等流通模式创新带动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推动农产品由非标转为标准化,提升农产品及服务附加值,缩小城乡差距。

3. 深度链接全球要素并带动形成更高层次内外贸市场双向循环。李克强总理于2021年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措施,推动外贸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近年来受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我国形成多年的“两头在外”模式面临极大挑战。一方面,大量外贸产品开展出口转内销战略,但由于内外贸不同线、不同标、不同质等系列问题面临巨大困难;另一方面,我国急需的一些高新技术、专利产品进口受到很大限制,阻碍了我国创新发展的步伐,将我国锁死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自主权、独立性和安全性。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一方面可将国内强大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牵引内外贸双循环的重要动力,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和更深层次地促进要素在商品服务、要素资源和消费市场等领域的流动,进一步扩大进口消费,打破优质出口商品转内销的信息壁垒,破解国外关键技术、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瓶颈,畅通内外贸市场循环;另一方面依靠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手段积极推动实施流通升级战略,突破品牌设计、零售业态、技术装备、供应链管理等关键流通环节,依托流通的品牌和渠道优势对制造企业进行品牌和渠道赋能,促进生产方式转变,推动内外贸企业将价值链或产业链延伸到国内外要素及产品市场并向高附加值、大规模经济状态演变。

4. 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并带动形成更加协调跨区域市场双向循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体现在区域间失衡,且在科技创新、结构转型、国际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日益加剧。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环境下,国内各区域之间只有通过产业分工协作来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曹允春和连昕,2021)^[26]。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一方面能够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和利益樊篱,打通跨区域要素流动过程中的断点、堵点,引导生产要素顺应不同区域的发展趋势,在向中心区域集聚的过程中得当配置,使生产要素沿经济带呈现中心区域集聚向辐射区域扩散的地理分布特征,从而实现产业协作,推动打造分工禀赋优势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功能定位相一致的分工格局;另一方面通过联通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及其带动的生产需求并将其转化为畅通跨区域的重要动力,构建满足多样化需要的竞争市场,实现效率变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提供新的动能。

三、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内在机理与关键机制

(一) 信息传导机制

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要促进消费与投资有效结合,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当前国内生产消费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依旧存在,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严重制约了扩大内需的推进及供给侧的改革成效。流通作为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在促进供需匹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双向引导和调节作用。王晓东等(2020)认为,流通业通过向制造业反馈需求信息发挥先导性,通过利用其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纽带地位向上游反馈需求情况^[28]。而对于下游而言,胡东宁和李沐霖(2020)提出,通过扩大流通活动范围,提升流通效率,流通企业能够为消费群体提供更全面的商品信息^[27]。因此,现代流通体系对于供给侧及需求侧而言均具有信息传导功能,其承担着捕捉消费者信息和生产者信息、推动产销对接以及缓解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等重要作用,能够化解企业结构性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和适应性。

在双循环背景下,只有强化供需匹配,实现精准对接,才能改善生产与市场脱节的现状,畅通宏观经济循环,而这也是国家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要求之一。如图2所示,在“需求侧—现代流通体系—供给侧”链条方面,在市场经济阶段,市场需求与结构决定了生产规模与水平(纪宝成等,2017)^[29],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郑慧,2016)^[30]。因此,消费升级是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流通处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对需求侧信息的变动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方面能够更低成本、更高效地察觉和捕捉消费升级引发的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并实时反馈至供给侧,实现商品流动不同环节的有效衔接,降低社会分工试错过程中的盲目性(王晓东等,2020)^[28];另一方面通过搭建市场信息系统,生产企业能够分析消费需求及收入年龄等结构的变化预测未来的消费走势,从而以消费者为中心,借助商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构成的渠道体系,再造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进行针对性的产品提质升级及新产品开发,缓解传统生产企业面对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时难以化被动为主动的局面,实现供给侧升级。

在“供给侧—现代流通体系—需求侧”链条方面,消费者总是希望获取更多的购物信息,使自己在购物中处于有利地位(邓发云和林志新,2013)^[31],但目前消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致使消费需求低频,严重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现代流通企业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信息共享体系,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沟通搭建了桥梁。第一,现代流通体系的信息传导功能能够沟通供需,将生产升级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反馈至需求侧,激发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或创造新需求;而消费需求个性化及多样性能够决定消费升级的方向并推动需求侧升级(丁琪和陈刚,2019)^[32]。第二,作为企业及产品服务信息的“过滤器”,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有效地减少商品及服务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确保消费者获得产品信息的真实性,保障其合法权益,从而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升消费体验及消费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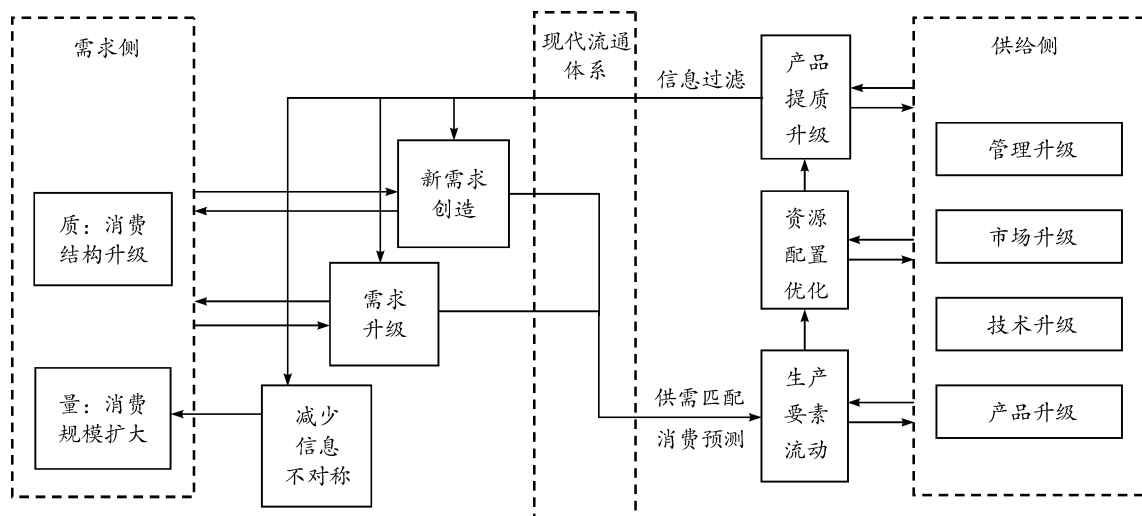


图2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信息传导机制

(二) 结构牵引机制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学者们认为流通具有引导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构牵引功能。例如,汪旭晖和陈佳琪(2021)认为,流通业逐步推动制造业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流通”为中心,同时流通逐渐成

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产品则演变为价值创造的载体^[33]。这一角色转换推动制造业价值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化,进而优化制造业布局,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于需求侧而言,刘婉瑛和尤绪超(2019)认为流通规模扩大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和可得性,逐步改变其消费习惯^[34],进而形成新消费模式、优化消费结构(旷健玲,2019)^[35]。因此,流通能够整合生产者供给,推动供给侧及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消费在质和量方面的提升。

传统流通企业经营模式较为单一,且同质化严重,对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优化作用有限。相比之下,现代流通体系能够带动需求侧消费需求升级,并为供给侧生产方式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推动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如图3所示,在“需求侧—现代流通体系—供给侧”链条方面,消费升级能够推动消费规模提高和消费结构优化,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新的或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提升流通技术应用效率、优化流通结构才能满足新消费需求,保持消费升级的持续性(谢家贵,2020)^[36],例如当前不断涌现的云逛街、云物流等新业态,即为消费需求变化下流通手段的变革与创新。此外,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打造,扩大内需的重要性逐渐提高,相关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和措施。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现代流通业可利用政策红利,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孙伟仁等,2018)^[37]。马克思将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归纳为: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对生产起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因此现代流通与生产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作用(王晓东等,2020)^[28]。首先,随着现代流通业优化升级,其功能得以优化延展,向供给侧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专业化程度提高,间接推动供给侧改变生产方式,推动生产企业由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区段转移。而不同产业的替代弹性和各部门的产出增长速度是影响生产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陈洁,2019)^[38],故会推动供给侧升级。部分具备实力的现代流通企业甚至可以向产品制造端渗透,以逆向整合的方式推动制造业企业在技术、管理、市场及产品方面转型调整,实现供应链整体优化升级。其次,现代化生产下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生产时间约占20%,流通时间约占80%,因此加快资本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快商品流通(祝合良和石娜娜,2017)^[39]。高效的流通企业通过优化流通要素资源的流动,助力生产企业加速商品的价值实现,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推动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研发设计、设备更新、人才引进等方面,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供给侧升级。最后,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推动了流通渠道的创新,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打破了产品和要素区域交流的阻碍,改善了空间联系,以更便捷、更快速的方式实现产业和要素在更大空间和更广范围内的流通与交换,一方面优化了商品、劳动力、资金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构建健康、良性循环的市场竞争机制,打造统一大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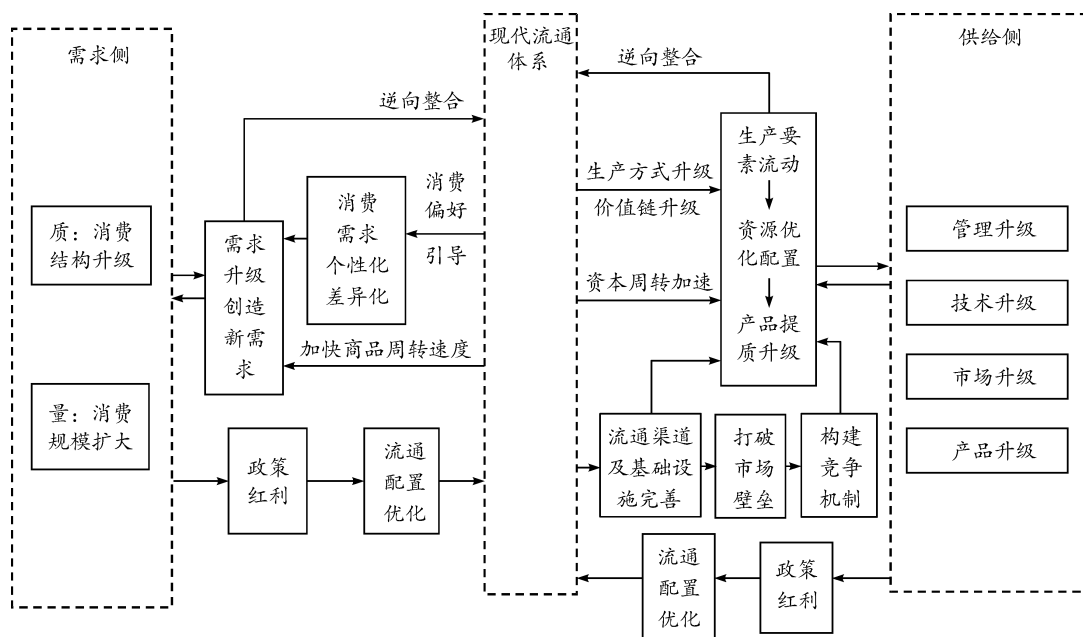


图3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结构牵引机制

在“供给侧—现代流通体系—需求侧”链条方面,一方面,商品流通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商品积压,对商品流通活动形成负面影响(胡东宁和李沐霖,2020)^[27]。因此流通业为适应供给升级的趋势,必须进行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如2020年工信部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要广泛普及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模式新业态。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优化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孙伟仁等,2018)^[37],而流通现代化,或者流通业的现代化程度会对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产生影响,为消费升级提供支撑(胡东宁和李沐霖,2020)^[27]。一方面,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在提升传统消费规模的同时,加速了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的孵化,增强了商品及服务流通渠道的畅通度,推动了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及服务快速进入消费市场,有利于促进消费、创造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制造业及现代流通业能够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合理引导,推动定制生产等模式创新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还能够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激发消费潜力。

(三) 要素优化机制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曹允春和连昕(2021)也认为,新发展格局是通过扩大内需更好地联动国内国际市场,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6]。由于内外贸市场割裂,市场主体较难根据市场信号自主进行内外贸业务活动的选择与转换,而流通具有深度链接国内外市场的要素资源配置功能。在物理界限方面,王先庆(2020)认为,流通基础设施是连通内外贸市场的重要战略节点和支援中心^[13]。通过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打破国内外市场的资源沟通瓶颈,打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商品物流的主干动脉及微循环通道(柳思维等,2020)^[40]。在贸易边界方面,胡德宁(2021)认为,通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流通新业态,能够更紧密地联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破原有的内外贸易界限,统筹两种资源,真正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41]。

双循环的核心任务在于基于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借助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链条完整、战略空间回旋大的优势,扭转传统的过度依赖国际循环的现状,打造新型的市场经济循环模式。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顺应双循环战略,统筹内外的必然要求(王雪峰和荆林波,2021)^[25]。传统流通由于辐射范围受限,统筹内外市场的能力较弱。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有效破除区域壁垒,增强流通渠道通畅度,推动要素资源在更广范围内有序流动,实现内外市场协同发展。如图4所示,在“需求侧—现代流通体系—供给侧”链条方面,高远(2019)认为,消费升级已成为我国流通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2]。内外贸需求侧升级往往会催生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一方面能够扩展和整合流通渠道,促进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利用内外贸市场协同的相关政策红利,优化自身资源配置,降低流通成本,实现现代流通体系升级。而在供给侧方面,首先,深度链接内外贸市场的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推动更大范围内的供需匹配。例如,根据外贸企业的销售需求,依靠流通网络推动外贸内销对接,从而打破优质出口商品转内销的信息壁垒,为具有产品品质优势的外贸企业与国内零售企业搭建沟通渠道,为外贸产品找到新销路的同时,也为内贸企业带来国际消费市场的信息,最终促进内外贸协同发展,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次,现代流通体系的供应链上下游联结枢纽作用更为突出,有利于缓解甚至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推动国外要素资源的引进及国内要素资源“走出去”,破解制造业价值链长期中低端锁定困境,带动我国制造业增长方式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再次,在国内外贸易不断发展、流通渠道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内外贸市场的运作方式更为公开明晰,检验检疫、支付方式、通关物流和退税与结汇等差异逐步缩小,国际贸易环节与链条实现重组,国家和地区市场界限逐渐模糊,这一方面缓解甚至消除了我国内外贸市场分割的弊端,促进内外贸企业通过协同发展增加风险抗性,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史晓青和林全杰,2017)^[43];另一方面能够构建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迫使企业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市场结构。最后,传统内外贸企业大多服务水平和品牌化运营能力偏低,而现代流通体系通过推动个性化定制营销、精准化推送、全程可追溯服务等新流通模式,能够创新销售渠道,通过资源配置优化带动内外贸企业产品品质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提升产品及服

务附加值。

在“供给侧—现代流通体系—需求侧”链条方面,第一,内外贸企业的协同发展必然会推动内外贸市场的规模提升,也对现代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例如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欧班列、匈塞铁路等项目大大提升了现代流通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推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第二,通过对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整合,流通业可以借助内外贸协同优势,实现供应链全链条的信息共享,提升现代流通产业的运行水平。在需求侧方面,首先,现代流通企业内外贸市场拓展能力不断增强,其沟通国内国际生产的能力随之提升,能够将国外生产企业新技术、新发明及新供给传递至国内,激发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或创造新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其次,当前我国制造业尚未形成针对不同消费人群提供差异化产品供给的能力,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外溢,大量消费流向国外。供给企业结合外贸发展的新技术、新供给、新趋势,借助流通大数据手段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合理引导,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不仅可以优化消费结构,还能够推动消费规模的提高,缩小内外贸发展差距。最后,传统的国内外市场一直以来存在严重的地区分割现象,交易中间环节多、中间成本高,导致交易市场运作效率低下(冯君琦,2017)^[44]。跨境电商、直播电商等流通新业态的发展及流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增强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度,促进资金周转,推动内外贸企业将价值链或产业链延伸到国内外要素或产品市场,从而提升消费规模,创造新消费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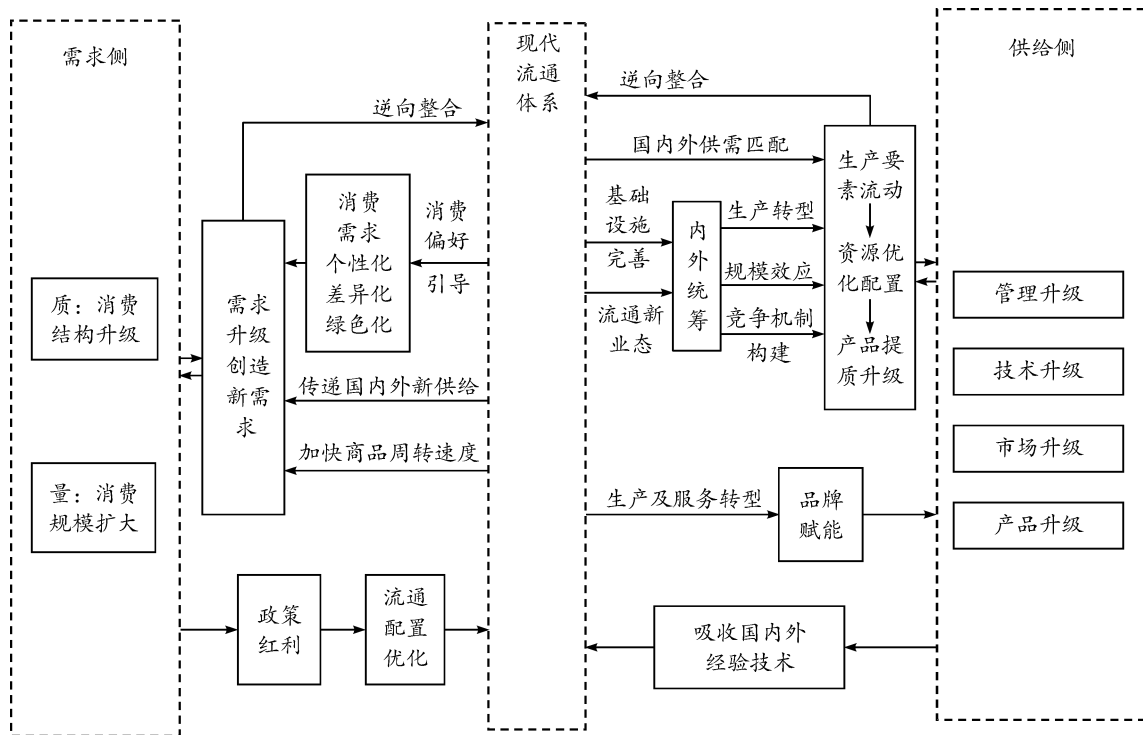


图4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要素优化机制

(四) 科技创新机制

2020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提升企业发展活力。现有部分学者对流通的科技创新功能进行了阐释。对于供给侧而言,任保平和豆渊博(2021)认为,信息技术的变革催生了流通新业态的发展,也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45]。新业态能够促进各领域新技术交叉融合,重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创造出新的发展优势(陆明,2020)^[46]。而对于需求侧而言,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使消费便利化、场景化,且新型消费平台的打造促进了定制消费、知

识消费、健康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的产生,推动消费转型升级(任保平和豆渊博,2021)^[45]。

流通是科技创新中枢,是创新驱动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因素。但很多传统流通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对新型基础设施支撑以及数字消费的内容、场景及模式不够重视,对数智融合变革把握和判断不够。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更好地凝聚科技创新研发合力,优化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资源,逐步形成链条化经济,促进全链数字革新,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外需 + WTO”转向“产业 + 互联网 + 内外贸易”,助力双循环实现。如图5所示,在“需求侧—现代流通体系—供给侧”链条方面,从微观层面看,消费需求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拉动作用(产健和许正中,2020)^[47],能够推动现代流通体系通过技术革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及服务水平,更好地适应需求侧不断发展升级的消费需求。在现代流通体系对供给侧的影响方面,首先,流通数字化发展加快了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一方面生产企业凭借科技优势快速发掘消费需求,实现精准式生产,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推动产业链条逐渐完善;另一方面现代流通体系能够赋能制造企业,引导其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促进供给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其次,陆明(2020)认为,现代流通体系通过技术赋能带动或联合供给侧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形成专业化、智能化的产业链组织,通过规模效应形成新的产业集群^[46]。且由于知识、技能和专业的不同,产业之间知识技术通过溢出效应相互扩散,这种联动效应会通过知识、技能和专业的整合互补,影响创新联动和产业演进(李政和杨思莹,2017)^[48]。最后,流通数字化能够促进新技术与新模式、新业态融合发展,加强协同效应,从而联结供应链上游企业,加强企业间科技创新协同,实现产业集聚,增加有效供给,实现高效、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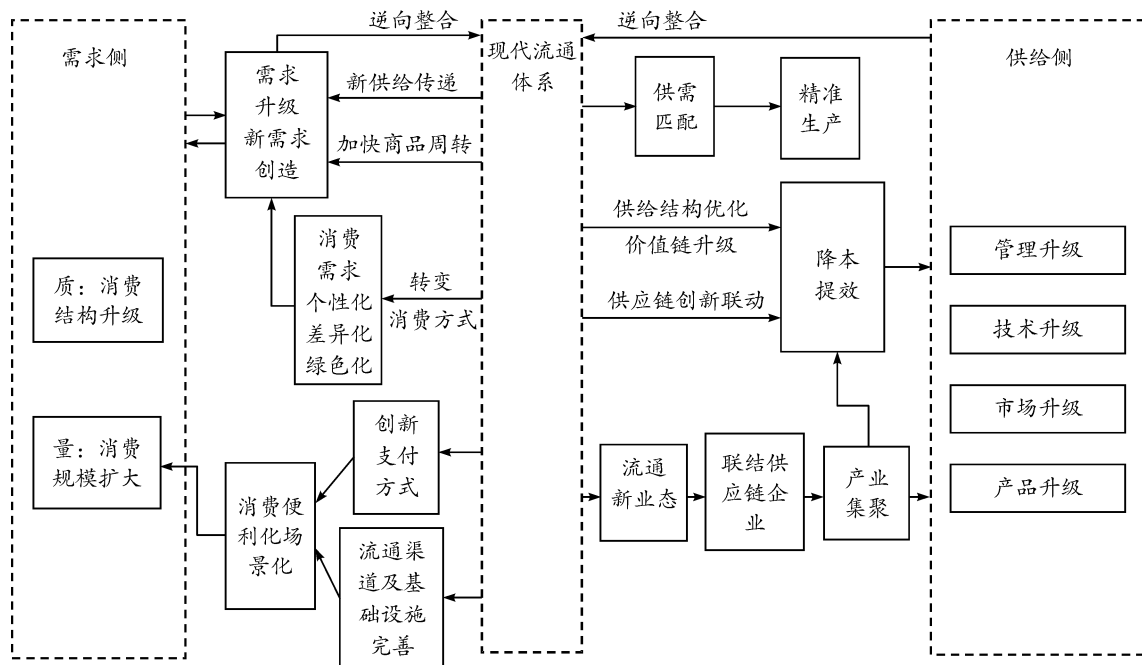


图5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科技创新机制

在“供给侧—现代流通体系—需求侧”链条方面,科技产业发展能够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李政和杨思莹,2017)^[48]。因此,供给侧创新能够推动现代流通体系通过逆向整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在需求侧方面,流通数字化能够带动提升产销对接效率,推动消费便利化场景化,促进消费结构转变(胡东宁和李沐霖,2020)^[27]。具体而言,第一,流通数字化能够保障社会化生产和生活性消费之间无缝衔接,推动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发明、新技术、新供给快速、便捷地反馈至需求侧,激发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或创造新需求。第二,流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打通流通过程中的堵点,畅通流通渠道,缩短产品周转

时间(祝合良和石娜娜,2017)^[39],有利于促进消费、创造消费需求。第三,现代流通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在满足居民高品质、个性化消费升级需求的同时带动消费方式转变,扩大消费者个性化、绿色化、高端化产品的消费比例,优化消费结构,提升消费规模,释放我国的内需潜力,助力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第四,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创新要素聚集的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一方面,基于电商平台的京东白条、支付宝花呗、借呗等新型数字金融方式发展迅速,丰富了资金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及支付宝支付覆盖了绝大多数电商平台,支付的多样性及便利性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提升了消费便捷性,故能推动消费规模提升,扩大内需。且“互联网+消费”模式不断创新使得更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被勾画出来,使得生活与金融的边界逐渐模糊,推动金融服务逐步渗透入各种消费场景之中,从而提升消费规模(许凌和陈龙强,2016)^[49]。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流通体系通过创新技术赋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能够消除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的市场扭曲现象,辐射更多消费者,向其提供更加全面更加便捷的商品与服务,从而提升消费规模,推动消费升级。

四、结论与建议

“21世纪将是流通的世纪,21世纪的经济将是流通经济”(陈文玲,1998)^[50],未来,现代流通体系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初步估计,我国目前三分之二的流通企业或流通业态仍然处于传统流通体系的阶段(王先庆,2020)^[13]。因此,对于现代流通业的发展国家应高度给予全面、正确的认识,并应围绕实施“强基”工程、“强技”工程、“强企”工程、“强业”工程以及“强市”工程等方面全面深化现代流通升级,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打造。

(一) 实施“强基”工程,补齐现代流通设施短板

首先,加快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布局。建设世界级港口群,设立沿海港口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推进海河、海铁联运;推广“异地运站”模式,提升全货机航线的国际通达性;支持建设一批中欧班列集货中心和枢纽节点,提升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和物流枢纽城市的中欧班列国际通行能力。其次,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沿江沿路沿海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和物流主干道建设,积极培育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构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大流通网络。最后,推动流通特色小镇和示范村创建工作,优化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完善镇级流通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村级生活综合服务中心,补齐农村现代流通设施的短板。

(二) 实施“强技”工程,推动科技赋能现代流通体系

首先,加快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现代流通领域的率先应用,推动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城市大脑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优先覆盖城乡高品质商贸集聚区,培育和拓展数字商务应用场景。其次,支持城市核心商圈、高品质步行街、夜间经济消费街区、旅游景区等加快数字化改造提升工程建设,创建智慧商圈,打造一批融合商业、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多业态的数字商务服务设施。再次,普及“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加快数字乡村创建试点,推动农村数字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农村数字生活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地区数字消费设施的短板。最后,推动生活服务领域消费大数据共建共享。建立消费领域数据交换交易标准,鼓励社会组织、平台企业等建立消费大数据中心,规范大数据应用并建立常态化分析机制。

(三) 实施“强企”工程,壮大现代流通市场主体

首先,发挥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势,以数字信息技术为纽带构筑商业生态系统,赋能“小店经济”,加快小店便民化、特色化、数字化发展,推动形成多层次、多类别的小店经济体系。其次,引导现代流通企业加强自有品牌培育,提升自有产品运营能力,探索与制造企业进行产品联合开发,打造有影响力的消费品牌。再次,支持有条件的现代流通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股权投资和战略联盟等形式,向境外拓展流通服务网络,打

造一批赋能“中国制造”的海外公共营销服务平台,推动“中国制造”品牌进入国外零售终端。最后,积极开展智慧商圈(街区)、数字商场(市场)等建设,培育壮大一批数字生活新服务重点企业和平台,打造一批数字化水平领先、便民惠民利民、具有引领效应的行业标杆。

(四) 实施“强业”工程,创新现代流通业态与模式

首先,支持中小零售商家上云和以数字地图、数字终端、移动支付作为入口,入驻数字生活服务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双向融合,增强数字化消费体验。其次,支持生活资料批发企业创新模式,建设网商展示区、网红直播基地等设施,拓展社交化、情景化和智能化的新零售场景。再次,支持生产资料批发企业的平台化、数字化升级,完善集中采购、金融支付、信用评价等线上交易服务体系。最后,开展城市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加强邻里中心、邻里街区改造提升,新建和改造一批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引导生活服务企业积极下沉社区,打造一批线上线下融合,集餐饮、洗染、美容美发、维修、托育等于一体的“社区15分钟优质便民生活圈”。

(五) 实施“强市”工程,优化现代流通市场环境

首先,引导市场主体合理把握开发节奏、科学配置商业资源,建立健全大型现代流通项目建设规划预审制度。其次,增加现代流通领域财政专项资金预算,对符合我国鼓励方向的内贸流通领域投资实施税费优惠,落实用电用水“工商同价”政策。再次,创新土地供给利用模式,在符合城乡规划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支持利用公共场所地下空间、原厂房等土地发展现代流通业。最后,加强现代流通行业动态监测,建立高品质步行街、夜间经济消费街区等高品质商业聚集区的网点面积、数量和业态监测制度。

参考文献:

- [1]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管理世界, 2020(12): 1-13.
- [2] 张倩肖, 李佳霖. 构建“双循环”区域发展新格局[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39-47.
- [3] 李震, 吕忠泽, 戴伟. 双循环相互促进: 理论逻辑、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4): 16-27.
- [4] 刘瑞.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与企业应对之道[J]. 企业经济, 2020(12): 5-13, 2.
- [5] 王韬钦. 长江经济带战略与双循环新格局的耦合逻辑及机制构建[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02-107.
- [6] 蒋永穆, 祝林林. 构建新发展格局: 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29-38.
- [7] 林周二. 流通革命: 产品、路径及消费者[M]. 史国安, 杨元敏,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13-214.
- [8] 祝合良, 杨光, 王春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思路[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1(4): 5-16.
- [9] 祝合良.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N]. 经济日报, 2020-12-21(11).
- [10] 孙前进. 中国现代流通体系框架构成探索[J]. 中国流通经济, 2011(10): 12-16.
- [11] 张俊娥. 基于绿色消费视角的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创新构建[J]. 商业经济研究, 2018(3): 36-38.
- [12] 朱立龙, 于涛, 夏同水. 我国现代流通业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J]. 中国流通经济, 2012(5): 19-23.
- [13] 王先庆.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关于现代流通体系理论探索的新框架[J]. 中国流通经济, 2020(11): 18-32.
- [14] 徐奇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和构建[J]. 金融论坛, 2020(9): 3-9.
- [15]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4): 4-23.
- [16] 姚树洁, 房景. “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机制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10-23.
- [17] 钱学锋, 裴婷.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理论逻辑与内生动力[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14-26.
- [18] 蒲清平, 杨聪林.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24-34.
- [19] 高丽娜, 蒋伏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经济发展模式演进: 承接与创新[J]. 经济学家, 2021(10): 71-80.
- [20] 高伟, 陶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现实逻辑与实施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11.
- [21] 李天宇, 王晓娟.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双循环”战略: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经济学家, 2021(5): 102-109.
- [22] 谢莉娟, 王晓东. 数字化零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2): 100-110.
- [23] 徐锋, 马淑琴, 李军. 习近平新时代流通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及其演化脉络[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8(9): 5-14.
- [24] 晏维龙.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当代视界与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76-83.

- [25]王雪峰,荆林波.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2):5-15.
- [26]曹允春,连昕.现代流通体系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学习论坛,2021(1):106-114.
- [27]胡东宁,李沐霖.互联网背景下现代流通发展对消费升级产生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0(17):17-20.
- [28]王晓东,陈梁,武子歆.流通业效率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流通先导性[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4):82-99.
- [29]纪宝成,谢莉娟,王晓东.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6):60-70.
- [30]郑慧.建立新消费升级体系[J].中国金融,2016(14):76-77.
- [31]邓发云,林志新.网络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信息行为研究[J].商业时代,2013(36):70-72.
- [32]丁琪,陈刚.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机理、短板与操作取向[J].商业经济研究,2019(19):48-51.
- [33]汪旭晖,陈佳琪.流通业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与作用机制:一个多案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2):22-33.
- [34]刘婉瑛,尤绪超.流通产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10):45-48.
- [35]旷健玲.多零售业态发展、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9(4):11-13.
- [36]谢家贵.居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效率提升的驱动机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21-24.
- [37]孙伟仁,张平,赵德海.农产品流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境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8(6):99-104.
- [38]陈洁.后疫情时代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动力机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0-111.
- [39]祝合良,石娜娜.流通业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中的作用与提升路径[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3):5-11.
- [40]柳思维,陈薇,张俊英.把握机遇 突出重点 努力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湖南社会科学,2020(6):26-34.
- [41]胡德宁.新时期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J].价格月刊,2021(2):30-35.
- [42]高远.居民消费升级驱动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效率提升的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22):9-12.
- [43]史晓青,林全杰.内外贸易一体化视角下我国商贸流通业渠道优化路径探索[J].商业经济研究,2017(21):33-35.
- [44]冯君琦.“互联网+”对内外贸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现代商业,2017(31):57-59.
- [45]任保平,豆渊博.“十四五”时期新经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与政策[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1):10-22.
- [46]陆明.创新驱动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0):53-54.
- [47]产健,许正中.消费结构升级、政府支持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空间视角下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18):28-35.
- [48]李政,杨思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实证检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41-52,204-205.
- [49]许凌,陈龙强.科技与消费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16(11):37-38.
- [50]陈文玲.论社会化大流通的形成与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1998(41):8-19.



(责任编辑 游旭平)